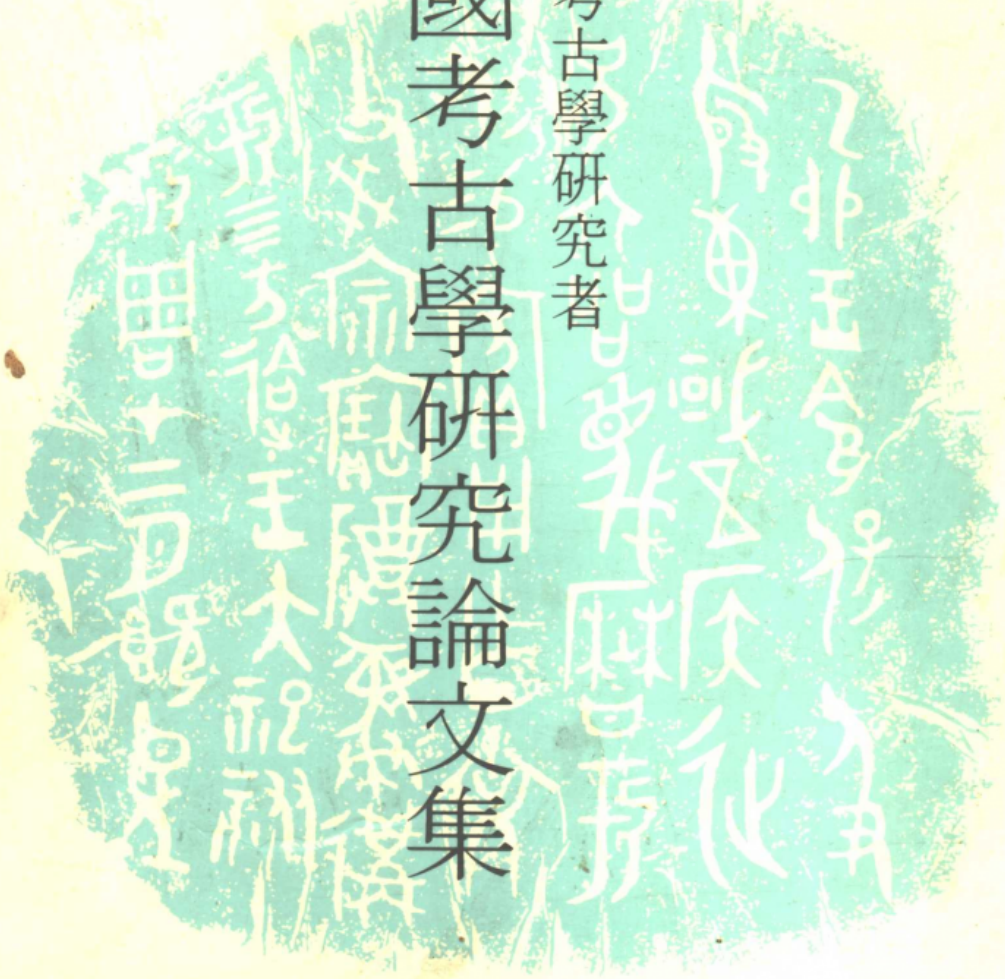


學日
研本
究考
者古

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日本考古學研究者

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樋口隆康主編
蔡鳳書翻譯

3278
6913

店

日本考古學研究者

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樋口隆康主編

蔡鳳書翻譯

東方書店 1990／香港

日本考古學研究者・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1990年3月30日 初版第1刷發行

主編者●樋口隆康

譯者●蔡鳳書

發行者●安井正幸

發行所●株式會社東方書店

日本國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1-3

電話 (03) 294-1001

經銷者●北京・中華書局

(除日本・香港地區)

中國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製作●八龍出版文化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土瓜灣美善同道43號美善同大廈5字樓

©1990 日本東方書店+樋口隆康+蔡鳳書

Printed in Japan.

ISBN4-497-90290-0 C3023

日本考古學研究者

中國考古學研究論文集

作者、譯者簡介

江上波夫 (Egami, Namio)

1906 年生。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卒業(考古學、東洋文化史專攻)。現任，財團法人古代東方博物館館長。

主要著作：《江上波夫著作集》全 12 卷，《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騎馬民族国家》。

樋口隆康 (Higuchi, Takayasu)

1919 年生。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卒業(考古學專攻)。現任，泉屋博古館館長、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主要著作：《古鏡、古鏡圖錄》、《古代中国を發掘する》、《北京原人から銅器まで》、《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学》。

林巳奈夫 (Hayashi, Minao)

1925 年生。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卒業(考古學專攻)。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現已退休。

主要著作：《中国殷周時代の武器》、《殷周青銅器綜覽 1 - 3》。

伊藤道治 (Ito, Michiharu)

1925 年生。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卒業(中國古代史專攻)。現任，關西外國語大學教授。

主要著作：《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国家の支配構造》。

松丸道雄 (Matsumaru, Michio)

1934 年生。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卒業(中國古代史專攻)。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主要著作：《甲骨文字》、《西周青銅器とその国家》、《中国文明の成立》。

横田禎昭 (Yokota, Yoshiaki)

1940 年生。廣島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卒業(考古學專攻)。現任，廣島城管理事務所所長。

主要著作：《中国古代の東西文化交流》、《世界の農耕起源》。

蔡鳳書 (Cai, Fengshu)

1937 年生。北京大學歷史系卒業(考古學專攻)。現任，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學教研室副教授。

主要著作：《考古學通論》、《大汶口文化討論文集》。

序

考古學多以實物為研究資料。能親自考察實物的學者有近水樓台之利，這是不言而喻的。在用考古學研究古代中國這個領域裏，比起其他國家的學者，中國學者自然要領先一步。但我們認為，將日本學者在考古學方面研究古代中國的成果譯成中文出版，仍不失為有意義之舉。

要從事科學研究，相應的研究環境至關重要。而這種研究環境的形成，有賴於長期的研究傳統。日本對古代中國的研究，既有悠久的傳統，在許多問題上獲得的研究成果也相當可觀。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研究環境，是十分成熟的環境。而且日本似乎還先於中國形成考古學這門科學。運用考古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古代中國，日本學者在某些方面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這樣說是不過份的。

研究日本文化，如果視野只限於日本，所得難免膚淺。只有把日本文化放在整個世界文化中進行比較、研究，才能真正理解日本文化的特點。研究中國文化同樣應該如此。

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時，其着眼點往往與中國學者不同。本書的出版，要是能對研究古代中國的考古學的發展多少有所裨益，那我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同時我們還期望，我們此舉能為促進日中兩國之間的學術交流作一點貢獻。

出版這樣一本書，最先緣起於山東大學副教授蔡鳳書先生的提議；本書的論文，亦主要由蔡先生推薦、選定。由於篇幅所限，有些水平很高的論文未能收錄，令人有遺珠之憾。這只有待將來再找機會補救了。

本書中文版的問世，得到了東方書店社長安井正幸先生的全面協助，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也在翻譯及出版方面給予了寶貴的支持。在此謹一併表示衷心的謝意。

是為序。

樋口隆康

1990年3月

目 錄

序	樋口隆康	
新石器時代的東南蒙古	江上波夫	
一、史前蒙古之探查		3
二、東亞考古學會蒙古調查班的調查		5
三、新石器時代東南蒙古的主要遺物		9
四、蒙古細石器文化的年代與系統		23
註		30
西周銅器之研究	樋口隆康	
序言 古銅器研究的方向		39
第一章 西周銅器的時代區分		42
第二章 新出的銅器羣之考察		51
第三章 單獨器之考察		87
第四章 結論		
——問題所在和解決的途徑		99
註		124
中國古銅器圖錄表		128
插圖出處		129
補記		131
所謂饗饗紋表現的是甚麼		
——根據同時代資料之論證	林巴奈夫	
第一章 前言		135
第二章 殷、西周時代青銅器上饗饗紋之優越地位		137
第三章 饗饗紋的從屬圖像		143
第四章 饗饗圖像的系譜		162
第五章 關於帝和帝使的若干問題		184
註		190
插圖出處		196
引用文獻		199

殷代史的研究

伊藤道治

序論	205
第一章 祖靈觀念之變遷	206
第二章 宗教的政治意義	222
第三章 祖先祭祀和貞人集團	233
結語	249
註及補註	251

西周青銅器製作的背景

——周金文研究序章

松丸道雄

前言	263
一、諸侯改作銘器的事例	267
二、諸侯倣作銘器的事例	283
三、西周器分類之嘗試以及它和“辨偽”研究之關係	292
四、青銅器鑄造法，特別是銘文與墊片的關係	300
結語	313
註	317
插圖出處	322
金文關係主要著錄類略號表	323

關於中國史前時代的二次葬

橫田禎昭

一、前言	327
二、分佈與年代	330
三、二次葬的諸形態	333
四、墓城內的二次葬	341
五、性別、年齡結構、隨葬器	343
六、結語	345
註	346
第一表參考文獻	347

新石器時代的東南蒙古

江上波夫

一、史前蒙古之探查

蒙古新石器時代遺跡遺物的研究頗為重要。這一點，近年來越發被人們認識到。另一方面，隨着日本、朝鮮、中國東北、華北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研究日新月異，東亞古代文化的輪廓漸次明確，過去那些以研究歐洲、西亞方面古代文化為主的歐美學者也漸漸轉向東方，涉足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等地區，並取得了一些考古學成果。通過東、西兩個方面研究的成果，使我們有可能對新石器時代乃至青銅器時代涉及到整個歐亞大陸的、廣大的文化圈，亦或大規模文化交流之存在進行推測。而且，蒙古處於真正東方的這樣一個泛歐亞大陸的廣大文化圈或者大規模的文化交流的中心位置，由此我們逐漸弄清楚了，蒙古在向東亞各方面廣泛傳播泛歐亞大陸諸文化時所起的作用。在考古學界掀起這種趨勢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各國對蒙古古代文化之探求。先是蘇聯的彼得（B. Petri）於1922年在貝加爾湖的新石器遺址之調查告一段落之同時，又着手對北蒙古科索格爾湖畔遺址之探查^①；1924年科茲洛夫（P. K. Kozlov）率領的蘇聯蒙古西藏探險隊有幸在外蒙古的諾音烏拉發現並發掘了匈奴的王侯墓，由此，對解明北方歐亞大陸的斯基泰系文化向東亞傳播的時代和路綫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②。

另一方面，法國的里森特（E. Licent，中文名桑志華）和台亞爾德·德·查爾丹（Teilhard de Chardin，P.，中文名為德日進）調查了黃河流域的地質、古生物、遺址，又於1922年，廣泛地

探查了興安嶺以東的蒙古地區，在林西、熱河、朝陽等地發現了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圍場附近的東家營子發掘了青銅器時代的古墳，對於東南蒙古古代文化之解明做出了貢獻^③。

另外，美國的安德魯斯（A. Ch. Andrews）探險隊的格蘭治（W. Granger）及其他人還於1922年至1923年間在戈壁沙漠採集到了石器及其他物品，1925年納爾遜（N. C. Nelson）主要在外蒙古一帶發現了同樣的新石器時代遺跡、遺物^④。

這樣，我們對蒙古新石器時代乃至青銅器時代的認識在二十年代急增，對蒙古的關心日益高漲，這一趨勢促成了我國的東亞考古學會的成立，1930年和33年由筆者等人組成的東南蒙古調查旅行得以實現^⑤。之後，滿洲事變後的1933、34年，駒井和愛、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人對東北蒙古的海拉爾地區作了調查^⑥。還有1933年以德永重康博士為主的滿蒙學術調查團對熱河、興安蒙古做了調查^⑦。另一方面，斯文赫定（S. Hedin）率領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也於1927至1935年從蒙古橫跨新疆，對亞洲內陸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⑧。東亞考古學會又於1935年再度派遣赤堀英三博士和我對內蒙古烏蘭察布盟作了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探查^⑨。而且該學會的浜田耕作博士和水野清一博士於該年對東蒙古熱河省赤峯紅山後的史前時代遺址做了發掘^⑩。另外，這一時期由多田文男博士等人對內蒙古錫林格勒盟的科恩香塔克沙漠地帶也作了調查^⑪。其後在世界大戰中的

1938—39年由丹麥的哈斯倫特·克里斯廷森（Haslund·Christensen, H）等人對錫林格勒——察哈爾地區作了調查^⑫。戰爭結束後，以蘇聯的吉謝列夫（S. V. Kiselev）為隊長的蒙古歷史、民族學調查隊於1947~49年對外蒙古作了廣泛探查，奧克拉德尼科夫（A. P. Okadnikov）所率領的別動隊主要以石器時代遺跡做研

究對象^⑬。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考古學者從內蒙到長城地帶的探查一直繼續到現在^⑭。

對蒙古古代文化的探求，自1920年以來，即使在戰爭中也未中斷，一直持續到現在。在這兒，我想以和我直接有關的1931年東亞考古學會探查的結果為中心，對新石器時代的東南蒙古作一個概觀。

二、東亞考古學會蒙古調查班的調查

東亞考古學會蒙古調查班由橫尾安夫（人類學）、松澤勳（地質學）、江上波夫（考古學）、竹內幾之助（蒙古語）、田中周治（攝影）五人組成。1931年6月28日由張家口出發，北上察哈爾盟，入錫林格勒盟，從西向東橫穿該盟，翻越興安嶺，跨過哲里木盟，於同年8月28日抵南滿洲的四平街。途中在察哈爾盟的托兒托·烏蘭·諾爾、錫林郭勒盟的東蘇尼特王府、阿巴嘎大王府、阿巴哈納爾·白音力府、貝子廟、東浩齊特郡王府、林西、白塔子、林東等地停留數日乃至數周^⑨（插圖1）。

我在這次調查旅行中主要是從事新石器時代遺跡和遺物的探查，在西拉·諾爾湖畔、奴富斯河流域、富爾·查干諾爾湖西北、柴達木·諾爾湖畔、博格多山（聖山）、巴特洛·赫烏蘇、林西西門外黃土台地斜面和該城南砂凹地等處發現了遺址。除博格多山（聖山）、林西西門外黃土台地斜面遺址外，大都是遺物散亂在砂丘表面上的單純散佈地（插圖2），但在柴達木·諾爾湖畔和巴特洛·赫烏蘇，細石器散佈地上遺存有爐址。在貝子廟盆地的柴達木·諾爾直徑約7米的範圍內個別混雜有砂的黑土層稍微隆起，在這兒發現了用石塊圍起來的兩個爐址，二者相距約4米。爐址之一為長徑約1.4米、短徑約60釐米的長橢圓形，其上並排着大小十數個石塊；另一爐址為長60釐米、寬55釐米的矩形，爐的三面用三塊石頭圍着，其右側之石被利用做為大的石臼。然而這兩個爐

址內部都充滿了黑灰，從前者爐址中還發現了獸骨的碎片。從後者爐址東南僅1.5米的地方發掘到頭向西北直肢的成年女性骨架一副^⑩。這些爐址和人骨都在前面所述的黑土層中。這些黑土層現在還存在着，土層很薄，最厚處僅15釐米，其下是砂層。在靠近爐邊埋葬屍體的現象古代並不少見。這個柴達木·諾爾的人骨例可能和爐址是同一時代，也就是說可能屬於新石器時代。另外，把粗大的石臼用做爐石使用的例子在巴特洛·赫烏蘇的遺物散佈地上也有。這些爐址所在地估計為新石器時代的野營址大抵沒有什麼錯誤。

位於貝子廟盆地北側的博格多山（聖山）為一標高300米左右高大的山形地帶，在這個接近山頂的地方聳立着一個突出來的石英岩峯，在峯背面的斜面上發現有許多粗粗打過的石英破片和未完成的石器散佈在那裏。其大塊破片多呈稜角尖銳、兩面加工的舊石器狀，當然這並非舊石器，而是判作更為細小的石器砍下來的殘骸，可以視為不定形的石核。在小型的石片中稀罕地發現有可以認為是尖石或石匕的完成品。陶器類一點也沒有伴出，由此推斷這裏是利用博格多山（聖山）石英岩製作石器的新石器時代的工場址。

林西西門外黃土台地遺址位於黃土台地的東南斜面上。在現已成為穀子地的地面上散佈着無數大型的石器，大多數是打製石器，有石鍬、石斧、敲石、石匕、尖石之類，但也有磨製石器，主要有石棒、石磨盤，此外有少量的石刀、石斧、石犁

等物。我們雖沒有做發掘，但從觀察到的來看，這兒可能埋着居住遺址。這裏的遺址不是砂丘遺址，只包含有極少量的細石器，這一點值得注意，它與出土過豐富的細石器的林西城南的砂凹地遺址大不相同。

除了上述的博格多山（聖山）和林西西門黃土台地遺址之外，我們所遇到的遺址全都是砂丘地的遺物散佈地。這些散佈地多處在湖畔、河邊、有井的窪地等地方，其中發現有豐富的石器或陶器。這些遺址是現在橫貫砂丘之下的黑色、比較固定的砂層在舊湖畔、舊河邊露出，構成棚狀的地面。砂丘遺址最密集的地方是富爾·查

干諾爾湖邊和貝子廟盆地，從這些地區的遺物散佈地某一處有時可以採集到數百件石器和陶片。

我們在調查旅行中蒐集到的遺物總數可達五千件以上，但石器和石器破片以及陶片幾乎佔了全部，其他伴有極少量的獸骨，骨角器類完全沒有發現。

石器有打製和磨製兩種。前者主要是石刃、石匕、尖石、石錐、石鏃、石刻刀、敲石、石核等形式，石質多為燧石、瑪瑙、玉髓、碧玉、石英等硬質美麗的石質；後者為石磨盤、石磨棒、環石、石斧、石犁之類，以花崗岩、安山岩、石英粗面岩等為主要石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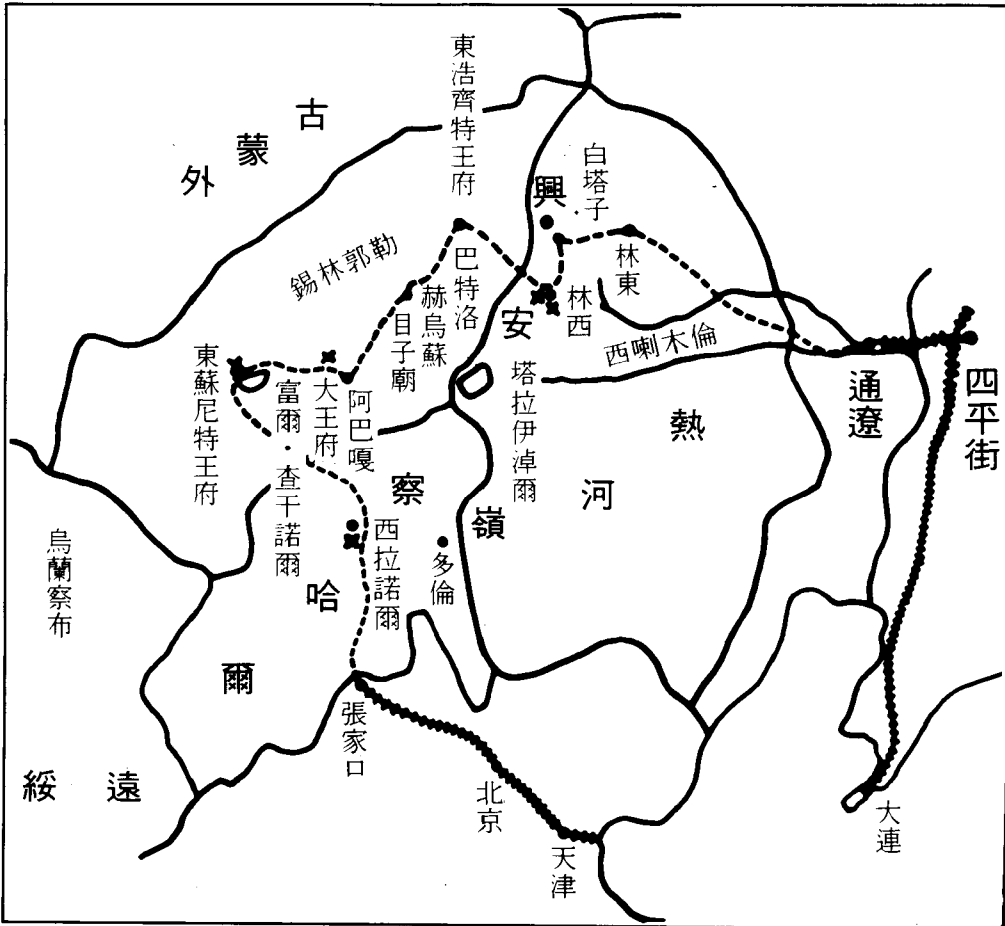


插圖1 東亞考古學會蒙古調查班路線圖（1931）

貝子廟以西打製石器的形體較小，即以所謂的細石器（*microlith*）為主體；與此相對，貝子廟以東的地方多出現較大型的打製石器。特別是興安嶺以東，這種傾向顯著，林西西門外的黃土台地遺址出土品便是這方面的好例子。那兒的石斧、石鏃、石犁、敲石種類豐富，石犁中時不時發現有非常大的石犁。另外，貝子廟以西的蒙古高原磨製的石斧全然不見，而在以東的巴特洛·赫烏蘇等地却發現有石斧，從興安嶺山中的林西西門外黃土地遺址中，出土有打製和磨製的石斧，而且還發現有石刀（破片）、半磨製的石犁。這類磨製石斧、石犁、石刀等在東翁牛特的敖藍曼哈、赤峯紅山後等查烏塔盟諸遺址中有更加豐富的發現^⑩，在這些地方伴出有石鏃、石匕、石核等打製石器。從這些事實來看，興安嶺以西的蒙古高原和以東的東蒙古在石器文化上似乎有相當大的不同，這可能是盛行於南滿洲和華北黃土地帶的磨製石器文化向興安嶺以東的蒙古地帶波及的結果吧！

總而言之，草原和沙漠發達的蒙古高原是以打製石器文化，尤其是以細小的打製石器為主體的細石器文化為特徵，而黃土地、丘陵的草原、砂地錯綜的東部蒙古則具有中型、大型打製或磨製石器與細石相混合的石器文化特點^⑪。

其次，陶器中紅褐色或黑褐色砂質粗製陶器與所謂的篋紋陶器在蒙古高原上有較多的分佈；由印壓或篋描而成的弧線紋陶器和素面、連點的青色硬質陶器密佈於興安嶺以東的東蒙。但是，除了弧線紋陶器之外的其他種類陶器在分佈上儘管有多的和少的差別，可是無論在蒙古高原也好，還是在興安嶺以東的東蒙古也好，都無地區差別而廣泛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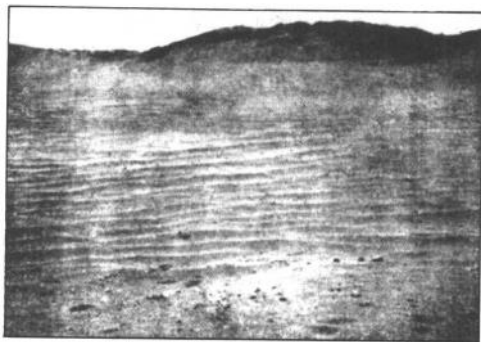


插圖2 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格勒盟富爾·查干諾爾西北砂丘遺址

在紅褐色或黑褐色砂質粗製陶器中，有素面的，也有施網格紋或刻點紋的，還有壓繩紋和蓆紋的，以及用凸線、附加堆紋、篋劃紋等裝飾的。器形多為甕、碗、鉢、大口壺等簡單器物，沒有帶流器或豆形器。底部有平底、尖底或鬲足的。不難想像，在這些紅褐色或黑褐色砂質粗製陶器中，包含有不同年代和系統各種陶器，但是其中帶有網格紋、刻線紋、凸線紋或附加堆紋的陶器則大體上和廣泛分佈於北方歐亞大陸的粗質陶器有着密切關係；另一方面，那些施繩紋蓆紋的陶器可以視為與華北的灰陶系陶器有關。在西拉諾爾發現的鬲形陶器上，同時施有後面將提到的繩蓆紋（地紋）、附加堆紋和篋紋，這暗示在蒙古高原上各種各樣的陶器接觸融合的結果，也暗示着這種陶器是偶爾產生的意外混成物（插圖3）。另外，那種口緣部外側加厚、其上繞以條溝、形成一段或四段魚糕狀*斂口的特殊型隆起紋的砂質陶器，可以視為分佈於華北的中國系陶器。

篋紋陶器是用梳齒樣的東西在陶器表面上劃出來、或是壓出來的、並行的小點或短線組成的幾何形紋飾物，這種陶器的

*魚糕是日本的一種日常食品，是將魚肉磨成漿狀，攤在木板上，呈半圓筒形的熟食品。魚糕亦名蒲鉾，日文為カカマボコ。——譯者註

胎土中滲有大量細砂，器內多施以緻密土質的陶衣。這種陶器和廣泛分佈於北方歐亞大陸的篋紋陶器是同一類器物，這是一目了然的。

由篋劃或印壓技法製成的弧線紋陶器密佈於興安嶺以東的蒙古地帶，在赤峯紅山後與彩陶共存^⑨。在林西西門外黃土台地遺址中也同時發現少量彩陶與弧線紋陶器，前者只是少數破片，其紋樣、色彩和器形都不明確，但其中之一是在一個碗形陶器的口緣上施以紅色紋帶的東西；其二是一個曲肩碗形陶器片，在橙色的底色上用黑色描繪有並列的斜線紋；其三是一塊小破片，難以窺其形，在紅色的底色上有用黑褐色表現的直線。另外，還發現與這些東西一起的僅把陶器面塗紅磨光的東西。這些彩陶一般來說器形小，製作薄，胎土中不含砂粒，施彩色的表面經過磨光

而帶光澤。這樣的彩色即使用水洗也不易褪色。林西西門外出土的這種彩陶器和赤峯紅山後的同類器一樣，毫無疑問是和華北彩陶屬同一系統，但前者較後者在器形、彩紋上都不免使人有遜色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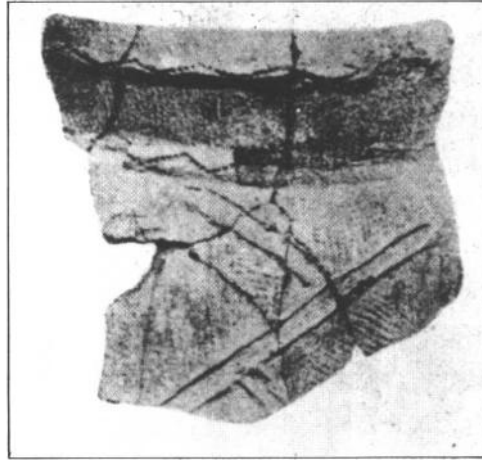


插圖 3 鬲器陶器碎片 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盟夏拉諾爾湖畔出土

三、新石器時代東南蒙古的主要遺物

下面我就蒐集到的主要遺物略述已見，可望以此有助於理解新石器時代的東南蒙古。

(一) 細石器

這種石器是從現在華北陝西省大荔縣沙苑地區、滿洲的黑龍江省的嫩江流域和吉林省安應縣永合屯等地的沙丘遺址中發現的²⁰，在沙丘滿佈的蒙古地帶，尤其是在蒙古高原的貝子廟以西有特別密集的分佈，值得我們注意。蒙古的細石器，最初由烏居龍藏博士等在北部興安嶺山中的烏舊木欽等地發現²¹，以後從彼得探查過的北蒙古柯索格爾湖畔遺址²²、納爾遜調查過的蒙古戈壁砂丘遺址²³，還有季托夫、托爾馬喬夫、駒井和愛、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人探訪過的海拉爾遺址中也都有發現²⁴。此外，斯文赫定率領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烏蘭察布盟各地，從百靈廟經三德廟到愛其那河之間也採集到無數細石器²⁵。因此細石器並不只限於如里森特一人所強調的東蒙古林西遺址²⁶，可以斷定，在整個蒙古全區，都具有新石器時代特徵的遺物。但是關於其分佈的疏密，如前所述，在我們所調查的範圍內，貝子廟以西作為打製石器來說，幾乎只有細石器；而貝子廟以東，中型、大型的石器漸佔優勢；而在興安嶺以東雖然有磨製石斧、石刀、石犁等磨製石器，但即使是在東蒙古，其砂丘遺址中出土的細石器和黃土地遺址中出土的中型或大型打製石器也是很卓

越的。這些事實表明，細石器的使用者和中型大型打製石器的使用者之間經濟生活有區別，在選擇生活環境上自然也有差異。

總而言之，關於東南蒙古細石器分佈及其疏密，確實與地區以及自然環境不同有關。這些都是將來在更廣的範圍內作更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課題。然而，給蒙古新石器時代賦於特徵的細石器之存在是任何人也無法否定的事實。在解明蒙古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問題上，不言而喻，以這種細石器為中心的研究是頗為重要的。

蒙古的細石器，無論是我們調查的東南蒙古的東西，還是彼得探險隊探查的西南蒙古，或者是托爾馬喬夫、季托夫、駒井、水野、三上諸博士調查的東北蒙古海拉爾的東西，或者是安德留斯探險隊納爾遜發現的中部蒙古的東西也好，在本質上沒有不同，都是以小型石刃(microblade)、石匕(microscraper)、石核(nucleus)三者為基本器形的石片石器，其中多伴有尖石(point)、敲石(hammerstone)，有的也伴出石錐(perforator, drill)和石鏃等物，偶爾也有石刻刀(burin)發現。前者主要是細石器佔絕大多數；而後者不僅數量少，而且根據地區的不同其種類也不相同。在我們所調查的範圍中，富爾·查干諾爾西北遺址和查伊塔木諾爾畔遺址上發現相當多的石錐和石鏃，而查伊塔木諾爾畔和巴特洛赫烏斯採集較多的是尖石和敲石。石鏃一般為無莖、長三角形，有的經兩面打擊，有時施以非常精細的加工。石核是從圓形